

北京大学社会学

学刊

第一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编

目 录

—— 专 项 研 究 ——

- 制度变迁和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
农村工业化中的历史角色 周飞舟 (1)

- 个人意见的公共性：中国六城市居民调查 唐文方 (48)

- 族群问题的“政治化”和“文化化” 马戎 (73)

—— 社会理论与方法 ——

- 分析单位、分层结构、分层模型 郭志刚 (90)

—— 人 物 纪 念 ——

- 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生涯 张美川 (109)

—— 阅读与思考 ——

- 当代情境的经典重构——重述社会学史 李康 (116)

- 个人主义和群体选择 陈强 (123)

- “大众”抑或“群氓” 苍旻 (131)

- 阶级意识误识与工人政治研究 田耕 (140)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社会学 学 刊

第一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

ISBN 7-301-06678-3

I. 北… II. 北… III. 社会学 - 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960 号

书 名: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编

责任编辑: 马 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678-3/C·024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9.5 印张 186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编辑委员会

(按拼音排列为序)

主	任	马 戎			
委	员	边燕杰	高丙中	高承恕	郭志刚
		刘世定	马 戎	邱泽奇	佟 新
		王汉生	王思斌	吴宝科	夏学銮
		谢立中	谢 宇	杨善华	叶启政
		张 静	周 敏	周雪光	

北京大学社会学

学 刊

第一辑

目 录

专 项 研 究

制度变迁和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

农村工业化中的历史角色……………周飞舟(1)

个人意见的公共性:中国六城市居民调查……………唐文方(48)

族群问题的“政治化”和“文化化”……………马 戎(73)

社会理论与方法

分析单位、分层结构、分层模型……………郭志刚(90)

人 物 纪 念

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生涯……………张美川(109)

阅读与思考

当代情境的经典重构——重述社会学史……………李 康(116)

个人主义和群体选择……………陈 强(123)

“大众”抑或“群氓”……………苍 旻(131)

阶级意识误识与工人政治研究……………田 耕(140)

专 项 研 究

制度变迁和工业化 ——包买制在清末民初农村工业化中的历史角色

周飞舟*

1 导 论

工业化之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自亚当·斯密到今天,经济史学界给出的答案是普遍见于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社会的、被称之为“斯密型”的增长形态(The Smithian Growth)。这种看法自亚当·斯密的经典论述以来,主要是指由劳动分工、地区专业化以及市场扩张推动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大大有别于工业革命提供的以机器生产、技术变迁为动力的所谓库兹涅兹增长(The Kuznetzian Growth)。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经济史学家通常将“斯密型”模式看做所有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包括非欧洲社会如中国、日本和印度。但是自吉尔茨(C. Geertz)于60年代对东南亚水稻农业的先驱性研究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基本否定了这种增长模式在东亚社会的普遍存在,认为工业化之前这个地区的经济形态实际上是一种被吉尔茨称为“过密化”(involution)的农业经济形态。^①“过密化农业”是在市场不发达、劳动分工不明显、自给自足而非市场生产的经济体中农民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者在边际劳动报酬开始递减、更多的劳动投入已明显“不合算”的情况下仍然大量投入劳动力而取得的经济总产出的增长。生产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剩余劳动力难以进入劳动力要素市场所致。吉尔茨的这个发现被其他学者应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中。黄宗智在对近代中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中就断定这种“过密化”的状况是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最为主要的特点。究其原因,除了在大多数落后经济体系中常见的人口过多、劳动力剩余之外,黄宗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19、20世纪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① C.,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的影响而导致农业商品化也是加速这种“过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①

结合 18 世纪末在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显然被认为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与工业革命兴盛于同一块大陆的“斯密型”增长模式被一些学者称为“原初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这些学者将其看做是工业革命的前奏,是一种“工业化前的工业化”。^②在他们看来,现代的、工厂式的机器生产只是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而第一阶段则是那些在 16 到 18 世纪增长迅速、纯粹为市场而生产的农村手工业。这些遍布欧洲的农村手工业的市场不但远达欧洲之外,而且形成了明显的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对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形成了显著的影响^③,正是这些变化为工业革命的发生“铺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过密化”农业在中国的清代中后期使得人口和生产率双双达到了一个极限,形成了伊懋可(Mark Elvin)所说的“高水平陷阱”^④。所谓“陷阱”,不言而喻是指进一步的增长和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极小。按照伊氏的观点,这种经济模式的前景实际上是死路一条。惟一的希望在 19 世纪口岸通商以来开始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⑤。黄宗智对这个题目进行了富有深度的研究,他的结论也相对比较明确:商业化带来的经济契机不但没有使农民走上“斯密型”增长的道路,反而加重了“过密化”的倾向。通过大量种植棉花等商品性经济作物,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更加密集的劳动,而商业化农业的风险也使得许多小农趋于破产。这个相对悲观的结论与一些中国受正统意识形态影响颇深的学者的看法深为契合,虽然后者往往从理论出发来得出中国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下面临崩溃的结论。

本文的观点与上述学者的颇为不同。我的看法是,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

① Huang, P.,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Huang, P.,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三位欧洲学者的论著即以此命名,见 Kriedte, Medick 和 Schlumbohm 所著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原初工业化的说法源自门德尔斯(Mendels)著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Press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landers*,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原初工业化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使得早婚制普遍流行,分家也变得兴盛,这直接导致了人口的相对过剩和农村工人的工资降低,而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参见“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80—1860: A Survey”, in Floud and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okyr,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795—18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④ 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⑤ 这个被西方学者广为使用的术语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在此之前的、明清时期的国内经济并没有商业化,这显然值得商榷。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商业化的进程变得异常迅速。国内经济不但迅速进入国际贸易市场,而且其内部的市场发展也日新月异。所以我在这里仍沿用“商业化”的术语来概括 1840 年以来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

影响下,除了大城市和通商口岸形成的资本主义部门之外,在某些农村地区也出现了“斯密型”的经济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长主要表现在农村手工业而非种植业上罢了。换句话说,农村“斯密型”的增长及引发的工业化发端于农村的手工业。

许多学者对手工业的看法实际上只是他们对农村种植业看法的某种“推论”而已。在许多学者看来,手工业在传统社会只是农业的补充,“男耕女织”是自然经济最为重要的特点。而这些本来就是补充地位的手工业首当其冲地被商业化带来的外国工业品冲垮了。这其中,受到破坏最为严重、几乎被完全摧毁的就是中国传统规模最大的手工业——手纺业,也就是棉纺织业中的纺纱业。^①自口岸通商以来,土布由使用土纱到用土纱作纬,洋纱作经,到完全使用洋纱,其过程颇为迅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布大部分已用机纱织就。^②土纱在土布原料中所占比重由1894年的76.6%下降到1913年的27.7%,正所谓风流云散。^③但是,在另外一些学者眼中,某些手工业部门远非只是在商业化面前消极地固守阵地,而是取得了实质性的增长,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纺业即织布业,也叫做土布业。罗斯基(Thomas Rawski)估计手工业在1914年到1936年之间的年增长率为1.4%。他的估计并不包括手工业的其他部门,只是棉纺织业的情况。虽然这个增长率并不算高,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同一时期“现代工业部门”(其中将近一半是棉纺织业)的增长率高达8.1%,就可以看出手工棉纺织业在这个时期的成就是如何惊人了,因为这个增长率是在与现代棉纺织业的激烈竞争下取得的。不仅如此,因为罗斯基是将手纺业和手织业放在一起计算,而手纺业在此期间是剧烈的衰退和负增长的过程,所以如果将手织业单独计算,增长率当远不止于1.4%。^④史建云则对华北平原上发达的手工业如手织、榨油、草帽缙等行业从技术到市场、组织等方面的变化作了详细的描述,虽然没有做出定量的估计,但她的研究强烈地暗示,农村手工业既非衰退,亦非消极退守,而是在走向结构性的转换和繁荣。^⑤我们下面用经验数据来看土布业在商业化浪潮中的地位如何。

洋布从1860年大规模输入中国,到1913年为止数量在成倍增加(见表1),

① 传统的棉纺织业是纺纱和织布两个步骤的结合。这两个步骤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都没有分离,纺和织是结合在一起的,参见吴承明:《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洋纱”一般指进口棉纱,均为机器纺成,所以也称“机纱”。本文中“机纱”一词除包括洋纱外,还包括本国机器纺纱厂所成之纱,文献中亦称“厂纱”。因此机纱是外国洋纱和本国厂纱之总称。

③ 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④ Rawski, T.,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⑤ 史建云:《手工业与乡村经济》,见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439页。

此后的下降是因为国内机织布的兴起。(而国内的机布 1894 年总产只有 539 万匹,到 1936 年则达到 40 967 万匹,约 80 倍于 1894 年的产量)。土布在总的棉布产量中的比重虽然在 19 世纪因洋布竞争而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趋势在机布大发展的 20 世纪反而不甚明显。据徐新吾的估计,1913 年土布占棉布总量的 65.17%,1920 年占 71.45%,1936 年占 43.16%。由于徐氏将清末民初农村兴起的铁轮机织造的布视为机制布,^①而 20、30 年代又确为铁轮机在农村土布业中最为兴盛之时,所以徐氏的后两个数字估计过低。根据其他学者的估计,1936 年左右土布在棉布总量中的比重当在 61—78.5% 之间,^②如果我们采用 70% 的中间估计,那么土布在与洋布和机布的竞争中反而有收复失地的趋势。

表 1 土布业在洋布和本国机布竞争下的发展(1860—1936)

项目	单位	1860	1894	1913	1920	1936
洋布进口	万匹	1 988.4	9 169.6	25 361.2	20 399.3	10 777.1
本国机布产量	万匹	—	539.1	1 756.0	3 663.6	40 967.0 ^③
土布在棉布应有产量中的比重	%	96.82	85.85	65.17	71.45	71.00 ^④

资料来源:徐新吾(1992),巫宝三(1947)。

土布业的这种表现令人困惑:这种农村手工业从什么地方汲取了力量同外国进口的洋布和本国城市机器织布厂中生产的厂布竞争呢?在农村经济走入过密化这种“高水平陷阱”的形势下,为什么农村工业可以获得如此巨大的力量?

本文力图通过研究民国时期农村的土布业,来回答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引致的商业化进程到底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何种影响?本文的结构可以按照问题的层次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1) 农村手工业在清末以来的增长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增长?是像传统社会一样,仍然徘徊于作为农业补充的、填满了剩余劳动力的“过密化”状态之中,还是变成了有显著的边际性收益的、类似“原初工业化”式的“斯密型”

① 徐氏的理由并不够充分,如果我们将手工业之概念限于人力用作动力,则铁轮机实属手工业确定无疑。因为此种织机并无任何非人力驱动装置。而将铁轮机织布排除于手工业之外的也仅徐氏一家之言。

② 土布在棉布中所占比重的估计为 43.2%(徐新吾),78.5%(方显庭),71.1%(巫宝三),61.0%(严中平),分别参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方显庭:《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华书局 1947 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业史稿,1289—1937:从棉纺织工业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过程》,科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③ 这个 1936 年的机布产量包含了许多仿制机布(以铁轮机生产的土布),所以数字过高。

④ 徐新吾的估计数为 43.16%,但由于不包括仿制机布,所以不够准确。在此用巫宝三的估计,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华书局 1947 年版。

增长?这部分主要通过历史的考察和举证,来确定手工业增长的性质。

(2) 农村手工业为何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兴盛繁荣起来?这种繁荣与当地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有何关系?这部分将通过构建区域工业化的数量模型来找出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间的因果联系。

(3) 如果经济制度尤其是生产和市场组织的变迁作用明显的话,那么制度变迁起作用的机制(mechanism)是什么?这个过程将主要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细致考察。

2 研究地点和范围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基地由广东逐渐北移,随着更多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和沿海城市的开放通商,到20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成为商业化最为迅速的地区。

苏浙二省位于长江下游,气候和地理条件极好,自北宋南渡以来就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农业中建立起优良的排灌体系,水稻单产大幅提高。人口增长迅速,随着人地比例的迅速上升,手工业和农村副业发展很快。到明清盛世,最发达的手工业尽集于此二省,其中江苏的棉纺织业、浙江的丝业和制茶业尤为著名。口岸通商以来,江苏、浙江以及上海为对外基地,出口商品由此运出,大量的外国工业品也都是经上海最先进入苏浙二省。19世纪上半叶,苏南的手织土布一直大量出口到英国,称为“nankees”,被视为布中上品。两省的丝和茶更是在19世纪雄踞各出口商品之首。

华北地区山东、河北两省及河南省北部是开发最早的地区,此地气候干燥多风、日照充足,适合棉花的生长,自明清以来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棉纺织业虽然不及江苏发达,但也非常普及。口岸通商以来,山东的青岛、烟台和直隶的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广州的对外港口。同时,华北地区的铁路也最为密集,胶济、津沪、平汉铁路贯穿三省,并通往津、青、烟三港,不但商业化程度极高的棉花、烟草沿铁路两边伸展开来,铁路沿线的手工业也受到商业化的影响而迅速变化。换句话说,这五个省不但有传统的手工业,而且这些手工业也强烈受到此地高度的商业化的影响,是我们考察本文诸问题的理想研究地区。

总而言之,这五个省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所在,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其中北京、南京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上海、天津、青岛是巨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北京、南京、洛阳也是历史古城。研究东部五省,无异于在研究一个“小型中国”。

进入20世纪之后,在华北和江南的许多农村地区都有比较繁荣的农村棉纺织业,其中有些地区完全是以商品生产和销售为目的,其收益高于农业的原初工业化区域。我在后面的数量分析中以县级的数据为分析单位展开,来

确定能够促使一个地区棉纺织业繁荣的主要因素。

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国民政府的邮政总局在 1934 年和 1935 年间的统计资料。这份历史资料的主要内容包括全国各个县级邮局的人员在当地收集全县在一年中外销、外运的商品情况,其中包括各种当地手工业产品的外销价格、总量和运销地点。由于这是邮政总局特别发动的一次物产调查而非常规的邮政统计,所以这些数据并非只包括通过邮局托运的物产,而是由邮局的工作人员在当地集、镇调查的结果,数据中包括一个县内所有重要商号的名称、所属行业和位置,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物产数据多来自对这些商号的调查。通过这些数据,我可以比较精确地算出全国每一个县每年外销的手工业产品的总值。由于我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棉纺织手工业的状况,而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集中在华北三省和苏浙两省。所以此处所用的资料包含了这东部地区五个省中共 478 个县的手工业品尤其是土布的外销数据。

至于这五个省每个县的其他资料,包括各个县的人口、土地、交通、历史背景以及当时手工业的生产组织情况,我是通过查阅各种零散的历史统计资料和经济史、地方志资料以及参阅其他学者的研究获得的。五个省的基本情况见表 2。

表 2 中国东部五省各县的基本情况

		县数	总人口	总户数	人口密度	农户总数	户均耕地	自耕农比重
华北	河北	128	219 568	38 711	262	33 027	23.4	69.9
	山东	107	342 700	62 264	303	55 314	19.0	65.9
	河南	107	310 296	54 514	260	45 662	22.0	56.3
	平均		286 477	51 024	275	43 953	21.6	64.4
江浙	江苏	61	533 134	105 886	347	82 898	18.3	38.3
	浙江	75	264 258	61 257	220	42 204	13.0	27.1
	平均		384 857	81 218	276	45 245	15.4	32.1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廿四年辑》;《中国实业志》浙江、山东、江苏分册;《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36》。

由于华北三省和江浙二省明显属于不同的经济区域,所以我在表中分别列出了它们的自然和经济情况。从表中来看,华北和江浙的地区差别较大,而在这两个地区之内,省际的差别却比较小。华北每个县的总人口、总户数较江浙地区为小,即华北各县的规模要小于江浙地区。人口密度是江苏最高,其次是山东,而其他三省的差别不大。就每个农户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来看,江浙地区要明显低于华北地区,分别平均每户 15.4 亩和 21.6 亩。两个地区土地租佃制度差别更为明显,华北三省自耕农在全体农户的比重都在一半以上,而江浙二省分别只有 38.3% 和 27.1%。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我将此五省分成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做分别的考察。

3 土布业在清末民初时的变化

在本节中,我将从市场、劳动力使用和收入等方面来考察华北和江南的棉纺织业在清末民初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这个时期某些地区的农村土布业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类似于西欧“原初工业化”式的农村工业,走出了“过密化”的困境。

棉花和棉纺织业在元代引入江南,^①在明代才普及和推广开来。这种推广的范围也并非遍布全国,而是大部分限于东部地区,西南地区仍以绩麻织葛为主。长江三角洲(我们常说的江南)不但普遍植棉,而且棉纺织业已经高度发达并向其他地区大量输出棉布,这些棉布绝大部分都是运往天气寒冷的华北和西北地区。华北地区也普遍植棉,但棉布却不能自给,需从江南苏松地区(苏州府和松江府)买入。^②徐光启说:“今北方之吉贝(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③可见当时棉花南运而棉布北销,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销往华北、西北的布在苏松地区称为“标布”,结实厚暖,为此时江南最盛行的布种。按照有关学者的估计,当时江南的棉布外销量不过3 000万匹。据残存的资料推算,其中当约有1 800万匹左右是销往华北的。^④

到了清代中期,华北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农户自织棉布最为普遍的地区之一。这个时期,华北冀鲁豫三省有3/4(76%)的县产棉,有2/3

① 棉纺织技术由一个名叫黄道婆的女人由海南带回她的松江(今上海)老家,在其有生之年,努力推广和提高棉纺织技术,松江府由此成为明清以来最大的棉纺织基地。

② 华北产棉而棉布不能自足的原因据说是技术上的落后所致,所谓“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枉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参见王象晋《木棉谱》),但是棉纺织技术相对比较简单易学,所以到清代,技术上的差距很快就被弥补,华北的棉布自给自足,苏松地区“标客巨商罕至”(参见叶梦珠《阅世编》),布、棉南北交运的局面便不再出现了。

③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岳麓书社2002年版。

④ 明代苏松地区运往华北的棉布有多少呢?我们只有残缺的资料可以利用。叶梦珠《阅世编》中说,“上阔尖细者为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前朝(即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资本数十万的商人是极少的,大多数是几万两,许涤新和吴承明二人将资本总数估计为300万两,按每匹一钱五、六分计算,那么松江外销的布匹不过2 000万匹,加上盛产标布的嘉定、常熟两地,整个苏松地区年外销标布最多不过3 000万匹,参见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当然,这些棉布并非全部运往华北,还有一部分运往西北。史料中所见的“秦晋京边”、“蓟辽山陕”常是华北和西北并举。惟有明嘉靖年间《常熟县志》提到,“……而捆载舟楫行贾于齐、鲁之境者常什六”,“齐、鲁之境”就是华北了。虽然常熟布只占江南标布的一部分,而齐鲁之境亦无法代表华北的全部,但“什六”的分配颇为合理,并且是惟一的线索,所以我在此按十分之六的比率推算,那么3 000万匹布中当有1 800万匹是销往华北的了。

(69%)的县产布, 后者的比重已远高于全国45%农户织布的平均水平。^①这使得华北地区由棉布输入迅速做到了布的自给自足, 不再从江南输入棉布。但苏松地区的棉纺织业并没有随标布衰落而衰落, 反而转而生产行销江西、两湖和两广的“稀布”, 此布盖因较标布稀薄凉爽而得名。另外, 乾隆(1736—1796)以后, 江南棉布打开了东北市场, 标布复兴, 且流通规模更胜于前代。前人有云: “松有劳纫之利, 七邑皆是。……冀北巨商, 挟资千亿; 岱陇东西, 海关内外, 券驴市马, 日夜奔驰; 驱车冻河, 泛舸长江, 风餐水宿, 达于苏常。……吾闻之苏贾矣, 松之为郡, 售布于秋, 日15万焉。”^②这说的是江北布商不畏远途, 驱车泛舸而南下贩布的情形。徐新吾所编的《江南土布史》以这条史料为基础, 估计松江府在清最盛时年外销土布达3 000万匹。^③这3 000万匹棉布大约有一半是销往蓟北(北京以北)和东北的标布, 另外一半则是销往闽粤的稀布。^④这是单指松江府而言, 如果再加上苏州府的常熟、无锡以及嘉定、浙江嘉兴一带的布, 江南地区全年进入长距离运销的约有4 000万匹, 生产能力较明代增加了1 000万匹。

棉纺织业在这个时期的增长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增长呢? 就华北而言, 大部分地区的棉纺织业处在自织自用的水平。对于农户来说, 棉纺织首先是为了自己穿衣, 如有余布, 则可以在地方市场上卖掉以换取货币。货币对农家而言也只是为了纳税和补贴家用, 我们很少见到华北农户靠织布扩大生产规模或买地的记录。^⑤当然在人多地少、口粮不足的地方, 纺织也可用来糊口, 所谓“以布易粟, 实穷民糊口之一助”。^⑥可见这种棉纺织业只是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 为了利用家庭多余的劳动力, 很少有远销市场。这种棉纺织业的状态和人多地少下的农业一样, 是一种“过密化”的手工业。

江南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这个地区棉纺织业的水平远高于华北。以松江府而言, 嘉庆15年(1810年), 松江府的人口有159万人, 松江一府

① 史建云查阅了近千部华北地区的地方史志, 从其引述来看, 这些地方史志上自嘉靖下至民国前后跨度逾300年, 但是最多则为康熙盛世。据史氏的计算, 华北冀鲁豫三省“329个县级行政单位(包括散州)中, 有251个产棉, 227个产布”, 并且“华北地区现存方志1600余部, 笔者所查阅的尚不足千部, 定有不少棉纺织业的史料被遗漏, 她在这部分主要描述清代棉业, 民国史志多不称引, 所以这里的估计都不涉及民国”, 参见史建云:《手工业与乡村经济》, 见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335页。

② 钦普:《松问》, 载《皇朝经世文编》卷28。

③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 在地方史志中, 常能见到农妇昼夜赶织的记载, 如“当窗杼轴自徘徊, 纳罢丁粮盐又催。今夜不眠需织就, 明朝里长复重来”(见光绪《吴桥县志》卷11), 但是诗中这位农妇彻夜不眠地赶织并非为了卖给收布商人, 而是为了在地方集市上换取货币纳税。

⑥ 《乐亭县志》卷5。

1805年一年的棉布外销量达到3000万匹，则年人均出布19匹。^①按每户5.35人的平均规模计算，则每户每年织布102匹。如果按每户有两个妇女劳动力计算，清代织一匹布需要6天，^②则她们要一年工作10多个月才能织完102匹布。按每个妇女劳动力每年从事纺织300天计算，则每天的净收入折合成本，在嘉庆(约1800年)以前是2.5升米，嘉庆以后减半，约为1.7升米，这可以算做一个妇女纺织劳动力的边际收益。^③这个水平的边际产出，约略低于一个从事耕作的男性佃农或雇工的边际收益。但是如果使女子下田而耕，或者使男子弃耕从织，则都不能达到上面的净收益。所以在松江府，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异常明确，也是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下最为经济合理的分工。^④换句话说，江南的棉纺织业虽然发达，但是并没有发展到将男劳动力吸引过来的程度，所以这个时期的棉纺织业既非有些学者所说的“过密化”经济，因为这几乎都是在为远程市场生产，边际收益也非常明显，但是也不完全类似西欧同时期的“原初工业化”，而是一种还没有将男性劳动力转移出来的“女性的工业化”。

但无论是华北还是江南的情况在清末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华北兴起了几个规模巨大的织布区，最为著名的是河北的高阳布区、宝坻布区和山东的潍县布区，这几个布区面积覆盖了附近的几个县，仅高阳和宝坻两县的土布产值就占河北总产值的51%。^⑤这些地区的农户几乎家家织布，致使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在繁荣时期高阳布区甚至吸引了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农民来布区“打工”。^⑥利用现有的资料，我对这3个布区的农民的织布情况做了一个总结，结果见表3。

①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纺纱约需一天，浆经、牵经、络纬约需一天，织布约需一天，则共6天，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业史稿，1289—1937：从棉纺织工业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过程》，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吴承明：《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纺织业净收益的研究，主要有王延元：《论明清时期江南棉织业的劳动收益及其经营形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本文的估计参考了两位的研究结果，具体的估算过程详见本人《清代江南的“女性工业化”——棉纺织业的净收益》一文。

④ 参见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伯重：《江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参见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手工业中之发展过程》，载《中国农村》1933年第1卷第3期。

⑥ 参见吴知：《关于乡村织布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其中对“打工”人员的省籍都有简略的统计。

表3 华北三个大织布区情况^①

	宝坻布区	高阳布区	潍县布区	平均
覆盖县数	3	10	3	5.3
商品土布产量(万匹):				
1911	480	不详	极少	—
1916—1917	不详	400	不详	—
1923—1928	400—500	500	1 000 余	650 余
1933—1936	100—200	100—200	1 000 余	430 余
手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45.8	53.8	48.4	49.3
参与织布之男性劳动力占男劳动力总数的比重(%)	50.0	75.0	53.0	59.3
一年中用于织布时间(月数)	9—10	8—9	8—10	9
织布收入占总收入(%) ^②	58.8	78.9	不详	—
每个劳动力织布工资对本省农业的平均工资 ^③	57:30 ^④	95:30	100:40	—

资料来源：吴知(1936)，方显庭和毕相辉(1936)，彭泽益(1962)以及国民政府主计处(1936)。

从此表可以看出，高阳布区的范围最大，覆盖和涉及周围的10个县，而宝坻和潍县布区也分别覆盖了周围的3个县。在1935年左右，仅这三个布区中心县的土布产量就达1 300万匹左右，占了华北三省土布产量的将近一半。在这些地区，手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在50%左右，这是欧洲经济史学家认定一个地区是否已经成为“原初工业化”区域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⑤超过一半的男性劳动力加入到织布的行列中来，农户一年中用于织布的时间也在9个月左右，这表明织布业已经从农业的补充一跃而成为这些地区农民的主业。这个变化从织布收入上看就更加明显。在宝坻和高阳，织布收入分别占农户年收入的59%和79%，织布劳动力一年的工资也远高于全省农业雇工的平均工资。这些考察的结果表明，在华北的一些地区，劳动力已经开始从农业向手工业转移，农业在这些地区已开始处于从属地位。而手工业也开始摆脱以前“织与不织，总要吃饭，不计工食，自然有赢”^⑥的过密化状态，在3个织布区，织布的净收入约为农业净收入的3至4倍，都是扣去“工食”计算的。在这些地区，一个妇女劳动力的织布报酬都明显高于全省其他地区的农业男工的工资收入^⑦，可见我们将这些地区发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① 表中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则为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其中劳动力使用及收入数据均为三个布区中心县(分别是宝坻、高阳、潍县)的情况，其他县数据缺乏，无从计算。

② 宝坻为总收入，高阳则为净收入。

③ 河北30年代农业长工工资按30元计算，山东按40元计算，均不计膳食，若计入膳食费用，河北约为50元，山东约为70元。

④ 此处为1923年数据。

⑤ Medick, H., *The Proto-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 in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eds.),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⑥ 沈氏：《沈氏农书》。

⑦ 我在计算劳动力的织布收入时并没有按性别区分，而是按每台织布机2.5个劳动力计算，所以在计算结果上是男女同酬的。

称为“工业化”都不为过。

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出现了类似于华北地区的变化，只是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清代中期棉纺织区主要集中在松江府，即现在的上海市。松江府周围的地区，虽然在明清时代亦有棉纺织业，但其兴盛程度远逊。清代中期自松江府溯长江而上，常熟、无锡等地都有棉布出产。其中常熟府年出布量 1 000 万余匹，仅相当于松江府的 1/3，行销亦以苏浙二省为主，最远到达山东、福建等地^①，显然不及松江土布的“衣被天下”^②；无锡产布主要在苏北销售，数量更少，年约 300 万匹。^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即松江地区的农村织布业由于上海市的兴盛而衰落，主要由于城市发展带来的非农机会成本的增加所致。

从 20 世纪初开始，织布业在江南一带经历着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地理上“放射性外移”的过程。在松江府以外的农村地区，土布业迅速发展，而在 20、30 年代到达极盛。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地区分布于松江地区的外围，其土布业的发展与上海的农村地区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彼此代兴的关系。这些地区包括苏南的江阴、常熟、常州，苏北的南通、海门，以及浙江海宁、平湖，在地理位置上对上海地区呈包围之势。我们同时将这些地区在 20、30 年代的土布产量列于下表中。

表 4 江南几个布区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土布产量和工资水平（万匹，元）

省治	县治	土布年出产量	女工工资(投梭机)	男工工资(农业)
江苏	江阴	1 200—1 300	2.3	1.5
	常熟	1 200—1 500	2.3	3.3
	常州	800	2.3	2.0
	南通	924	5	3
浙江	海宁	250	2.4	—
	平湖	160—200	2.2	—
	合计	4 804		

资料来源：徐新吾(1992)；林举百(1984)；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

从表中可以看出，松江地区周围几个大的布区的产量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松江地区极盛时 3 000 万匹的年产量，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布几乎大部分都是运往上海并通过此地的商号运销全国。这就告诉我们，土布的商业中心仍然在上海，但是生产地区向外位移了。和华北一样，这些新兴布区开始突破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男女分工的限制，正在变成像华北的三大织布区一样的原初

① 郑光祖的《一斑录》中说：“常、昭两邑，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两。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见黄昂《锡金识小录》：“坐贾收之，捆载而贾于淮、扬、高(邮)、宝(应)等处，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

工业化区域。^① 我将估算的这些地区织布的工资和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做出了比较,列在(上页)表4中。

表中江南各织布区的工资在20、30年代基本维持在每日2.3升米^②的水平,合3.5斤米。同一时期上海地区织工织布的工资约为3升米,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工资约低于上海老织布区25%。那么从土布商人的角度而言,在江南其他地区开展土布商业之所以比在上海更合算,就是因为可以节省25%的劳动力成本。^③

但是,这种土布业与农业相比仍是有利可图。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织布工资在大部分织布区都高于农业长工的平均日工资。这种情况促使这些地区的农户积极转向土布织造,以至于有些地区出现“荒田织布”的现象^④,而这种现象即使在松江织布区达到极盛时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如果我们将明清时期的松江织布区称为“原初工业化”有点勉强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江南地区兴起的众多织布区则开始变成地地道道的“原初工业化”区,此点应无疑问了。

① 江阴县的情况来看,全县户户织布,有一部分男性劳动力也开始加入织布的行列,但是没有华北地区那么普及。以江阴为例,此县20、30年代土布业极为兴盛,全县有“布机十万”:“据调查统计,(抗战前夕)全县共有投梭机57973台,手拉机30380台,铁木机12680台,共计101033台。”(参见萧步才:《江苏省江阴县手工织布业调查资料》,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1期。)这是约1936年左右的情况。据民国十九年(1931)的调查材料,当时江阴县总户数为147100户,其中农户总数为88200人,如果按照农户数来推算(据国民政府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廿四年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则每户有布机1.15台。如果我们按照投梭机和手拉机由女性劳动力操作、铁木机由男性劳动力操作的分工来粗略计算的话,则参加织布的妇女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约67%,男子参加织布的占男性劳动力总数的1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江阴的土布业同明清时期松江的棉纺织业相比,开始有男性劳动力加入,但是加入的程度极为有限,远远不如我们上一章讲到的华北的新兴土布业。

② 用投梭机来织江阴的“小土布”或者“乡丈大布”,在江阴盛行的包买制下所得的工资差不多,都是“一捆纱两斗米”,一捆纱可织成十匹布,一般是一天一匹,加上每捆纱的余纱归织户自己,约可值3升米,这样算下来,一个使用投梭机的织布妇女每天约有2.3升米的工资,如果扣去自己的口粮,则净得1.3升米,约合2斤米。相比之下,使用手拉机来织改良土布,20年代可得日工资3升米,扣去口粮,净收益为2升,合3斤米;如果使用脚踏机(铁木机)则每天的工资可达米4.5升,但这时便是使用男性劳动力,扣去口粮,净得米约3升,合4.5斤。如果我们将这个收益与松江地区同时代的土布业相比,就会发现两者的净得非常接近,都是在3—4斤米左右,但是松江的织户就此放弃了织布,而江阴的农民却趋之若鹜。从这里我们可以初步看出织布区从上海地区外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周边地区的农民对织布工资的要求很低,因为这个收益要高于其农业的收益。按照民国二十年(1932年)的统计数字,江阴县男性农业长工的工资为40元,约值米4石,合每天净得米仅1.1升米。可见这时织布的净收益已经超过农业劳动的净收益,这也是为什么男性劳动力开始进入织布业的重要原因。

③ 当时土布业职工的口述资料清楚地表明,上海土布业外移的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当时上海四郊的土布生产逐步萎缩,货源枯竭,上海一些土布号如恒乾仁、余源茂等,转移阵地,托常熟土布行向农民放纱收布。由于常熟的工资比上海低,而放机布比原来的常熟土布加阔加长,在上海容易打开销路。”参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

④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页。